

## 法学研究

## 西方法律人类学的产生、发展及演变

董建辉 徐雅芬

**提 要** 法律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在自身的学术发展中所形成的诸多理论与方法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文主要从人类学的角度,梳理西方法律人类学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末的产生、发展及演变过程,以期人们对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

**关键词** 法律人类学 演变 20 世纪

**中图分类号** D90

法律人类学(legal anthropology 或 anthropology of law)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初民社会法律文化的研究,来寻求对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一般性理解。法律人类学在自身的学术发展中形成的诸如“非国家”的法律观、法律文化论、法律多元主义等理论,以及参与观察法、跨文化比较法、功能分析法、文化阐释法等方法,为法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本文主要从人类学的角度,梳理了西方法律人类学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末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历程,以期人们对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

### 一、19 世纪 60 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 探究法律发展的历史轨迹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是法律人类学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亨利·梅因(Henry Maine)、巴霍芬(J. Bachofen)、摩尔根(Lewis H. Morgan)等深具法学知识背景的早期人类学家,对初民社会的法律现象表现出浓厚的学术兴趣。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从初民社会法律到现代社会法律的演变过程。梅因的《古代法》(1861)、《早期法律与习惯》(1883),巴霍芬的《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

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它们是法律人类学萌芽时期的经典著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因为直接受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影响,并对初民社会的诸多法律制度进行了细致描述,所以也可以算作法律人类学的早期作品。

梅因的《古代法》专注于初民社会法律制度的研究。他在该书中提出,法律史的研究不能从法典开始,因为“在这些法典的后面,存在许多法

国内很多学者将法律人类学视为是将人类学与法学相整合而出现的一门交叉学科,对此笔者不能苟同。因为法律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均来自文化人类学,且其对“法”的理解超出了传统法学所探究的法律、规章、政策等正式制度,而是将风俗习惯、禁忌、习惯法等非正式制度包括在内,这些都与传统的法学研究迥异。所以严格地说,法律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著名法律人类学家胡朗(N. Rouland)也说:“法律人类学是从社会人类学中发展起来的”。参见 Rouland, Norbert, 1994, p. 1。

巴霍芬和梅因都是大学法学教授,对罗马法及比较法学颇有研究;摩尔根则是律师出身。

在现代人类学中,“初民社会”被认为是一个中性词,比“原始社会”更不带歧视性意味。所以,本文在提及原始社会时,除非直接引用原文,否则都使用“初民社会”一词。

律现象,这些法律现象在时间上是发生在法典之前的”。梅因认为,法律研究应当探究社会和法律的原始历史,“如果我们能通过任何方法,断定法律概念的早期形式,这将对我们有无限的价值。这些基本观念对于法学家,真像原始地壳对于地质学家一样的可贵。在这些观念中,可能含有法律在后来表现其自己的一切形式”。梅因对雅利安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法律是沿着“地美士第”(Themistes)时代到“习惯法”时代再到“法典”时代的轨迹演化和发展的。他还以近乎公式化的语言提出了另一个著名论断,即“所有进步的社会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他认为,在早期社会中,个人受家庭和集团束缚,没有属于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取代了过去的身份依附,个人也因此获得了自决的自由。

巴霍芬的《母权论》开拓了家庭史的研究。他根据从古代经典著作中搜集来的材料,从宗教观念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法律观念的变化,解释了人类社会从“杂婚”到一夫一妻、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发展。他认为,最初在人们之间存在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杂婚”),这种关系排除了确切认知父亲的可能性,因此世系只能依母系——母权制——来计算。妇女作为母亲,作为年轻一代惟一确切可知的亲长,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这种尊敬和威望达到了完全由妇女统治的程度。向一个女子专属于一个男子的父权个体婚姻制的过渡,含有对远古宗教戒律的侵犯(实际上就是侵犯其余男子自古享有的可以占有这位女子的权利),这种侵犯要求由女子在一定时期内献身于他人来赎罪或赎买对这种行为的容忍。

梅因和巴霍芬的观点对摩尔根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古代社会》中,摩尔根依据生产技术的发展,论述了人类社会从蒙昧到文明的历程。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蒙昧时代(人类发明了用火、渔猎和弓箭)、野蛮时代(人类发明了陶器、畜牧业、农业和铁器)和文明时代(以文字发明为开端直至现代社会),又分别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并且阐明了财产

法、婚姻家庭法、复仇、赔偿等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对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 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使摩尔根的成果得到了更科学的阐述。

因为这些法律人类学的先驱人物持简单的单线进化论观点,将所发现的初民社会的各种法律制度,以西方法律制度为参照,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顺序加以排列,而在日后招致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他们以西方的法律制度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也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他们对初民社会无国家、无政府状态下特殊法律制度的关注,奠定了法律人类学的学科基础。他们使人们认识到,在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制度外,还有大量非正式的法律制度存在。正是这一新的认识,导致了法律人类学后来的发展,以至于有不少学者认为,法律人类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创立的。在梅因、巴霍芬和摩尔根等早期的进化论者之后,德国法学家波斯特(A. H. Post)、柯勒(J. Kohler)、亚当(L. Adam)等人于19世纪末创建了民族法学(ethnologische jurisprudenzen),并出版了《比较法学杂志》,继续大量搜集初民社会的法律资料。在英国,则有哈特兰(E. S. Hartland)的《初民法律》(1924)等著作问世。

## 二、1926年~20世纪60年代： 比较研究不同社会的法律文化

在法律人类学的萌芽时期,对人类早期法律制度感兴趣的人类学学者主要参考古代的相关文

梅因,1996,第1页。

同上,第2页。

“地美士”(Themis)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是指宙斯(Zeus)的陪审官,后来演变为希腊万神庙中的司法女神(Goddess of Justice)。“地美士”的复数“地美士第”也即地美西斯,意指“审判的本身,是由神授予法官的”(参见梅因,1996,第3页)。梅因所谓的“地美士第”时代也即神审判时代。

梅因,1996,第97页。

恩格斯评价说:“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961年,即巴霍芬的《母权论》出版的那一年开始的。”参见恩格斯,1972,第7页。

参见恩格斯,1972,第7~8页。

林端,2002,第20页。

献资料,以及殖民地官员、传教士、旅行者、航海家、商人等对仍处在原始状态的一些民族的零星记载来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共同缺陷,即他们的观点多带有猜测性和思辨色彩,缺乏实证资料的佐证,所以他们被后人讥讽为“摇椅中的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s in armchair)。摩尔根算是个例外,他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调查,但也仅限于美洲的易洛魁印第安人(Iroquois),缺乏与其他民族的实证比较。因为这一时期的研究尚未清晰地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没有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和方法,所以还谈不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真正使法律人类学确立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的人,是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

作为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关注的不是“人类怎样服从规则”,而是“规则应如何去适应人类生活”。他认为,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当然也包括法律)相互联系、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实体。因此,对初民社会法律进行研究,就要把法律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将它放到社会文化的脉络中去进行考察。考察的方法不是简单地列举规则,而是运用他所开创的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对正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习俗规则,包括“呼吁既定规则的生活条件,原始人据以处理问题的方式,社区的普遍反应,履行职责或玩忽职守的后果”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

马林诺夫斯基对初民社会法律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1926年出版的《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中,该书也因此成为标志法律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的作品。在该书中,马林诺夫斯基根据他对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岛民(trobriands)的研究指出,法律和秩序贯穿于原始种族的部落习惯中,土著居民之所以遵守法律,是基于道德、情感和注重事实的理性,而不是像很多人类学者以为的那样是出于自发与自愿。他们对责任和特权的观念,与文明社会几乎如出一辙。他采纳并发展了图恩瓦尔德的观点,认为在初民社会中,社会关系的法律性质的最明显标识是互惠和公平交换原则,“互惠、制度化的程度、公开性和抱负是奠定原始法律约束机制的主要因素”。

在此基础上,他给初民社会的法律下了一个人类学的定义:法律规则与其他规则的区别,就在于它们能被感受并确定为一个人的义务和另一个人的权利诉求,它们不仅受到心理动机的制约,而且是由以相互依赖和互惠为基础的特定社会约束力机制所强制执行的。马林诺夫斯基明确了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和限制,还包括互惠、交换等义务,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研究方法,从而为这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功能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也对初民社会的法律进行了研究,但他对法律人类学的贡献不及马林诺夫斯基。受美国社会法学的代表人物庞德(R. Pound)的影响,拉德克里夫-布朗主张,法律领域应限定在有组织的制裁的范畴内。他认为,“强加给个人的义务一般被看成是习俗,而不是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多简单社会是没有法律的,尽管它们的风俗也依靠制裁来支持运作。他的这一观点影响了埃文斯-普理查德(E. Evans-Prichard)等其他一些功能派学者。埃文斯-普理查德在《努尔人》中提出,他所说的法律只是“指一种通过习俗惯例的方法来解决争端的道德义务”,如果按照西方法律程序或法律制度的标准,努尔人(Nuer)的社会是没有法律的。不过,拉德克里夫-布朗关于通过研究现实的纠纷来发现规则的思路,也为后来的法律人类学指明了一个发展方向。

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在初民社会是否有法律这一论题上的分歧,导致其后的法律人类学者分化为两派:法学家派和非法学家派。法学家派以霍贝尔(E. A. Hoebel)、帕斯比普(L. Bospisil)、格拉克曼(M. Gluckmann)及卢埃林(K. N. Llewellyn)等人为代表,主张以西方的法律观念来界定初民社会的法律。例如,帕斯比普提出,不

马林诺夫斯基,2007,第84页。

同上,“前言”部分,第82~83页。

同上,第30页。

同上,第38页。本文根据其他译本作了适当的更改。

拉德克里夫-布朗,1999,第237页。

埃文斯-普理查德,2002,第194页。

同文化的法律应该具有 4 个共同的属性,即权威、普遍应用的意图、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制裁。他用这 4 个属性对法律领域和其他两个社会控制领域——政治和风俗进行了区分。按照法学家派对法律的定义,很多初民社会都被归入没有法律的社会范畴。非法学家派则以博安南(P. Bohannan)、罗伯茨(S. Roberts)、格利佛(P. H. Gulliver)等人为代表,主张放弃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术语,从土著居民的文化背景去理解他们的法律行为。例如,博安南在《蒂夫人的司法与判决》一书中就提出,只有从蒂夫人(Tiv)的思想和宗教概念体系出发,使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才能真正了解其社会控制体系“tar”的含义。一些非法学家派的重要人物,如罗伯茨,甚至放弃给法律下定义,认为法律人类学不应该纠缠于初民社会是否有法律,而应该切实研究它们的秩序如何维持,通过何种方式来调解纠纷与冲突。

两个学派都受到对方的强烈批评。法学家派受到的批评是,用西方的法律概念去解释初民社会的法律,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既容易把西方人的观念强加到土著的文化中,也无法理解初民社会法律的真正内涵。非法学家派受到的批评则是,没有在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淆。针对两派的争端,一些学者提出了培养本土人类学者的主张,认为由人类学者研究本土的文化,便可以克服两派各自的弊端。但问题的关键是,在充满西方话语霸权的人类学界,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类学者又如何能够摆脱西方文化的影响?

尽管存在着初民社会是否有法律、它们的法律是什么等争议,但在马林诺夫斯基奠定了法律人类学的学科基础之后,人类学对初民社会法律的专门性研究始终没有中断过。这些研究大多采用个案研究的描述方法,描画出特定人群或社会的法律制度。例如,冯·沃伦霍芬(Van Vollenhoven)创建的荷兰学派对印度尼西亚土著居民的阿达特习惯法(adat law)的研究、拉特勒(R. S. Rattray)对非洲阿散蒂人(Ashanti)的研究、巴顿(R. F. Barton)对菲律宾北吕宋岛的伊富高(Igao)人的研究等。一些学者则立足自身或他人的个案研究,对不同社会的法律进行跨文化比较,其中霍贝尔的《原始人的法》堪称典范。

在该书中,霍贝尔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发展程度,详细介绍了北极的爱斯基摩人、菲律宾的伊富高人,北美平原印第安人中的科曼奇(Comanche)、凯欧瓦(Kiowa)和切因纳(Cheyenne)部落,南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岛人、阿散蒂人等不同初民社会的法律制度。在此基础上,他就法律的文化背景,法律的定义、功能和特征,法律的历史发展,法律人类学的方法等诸多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看法,进一步完善了法律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他也因此被誉为继马林诺夫斯基之后最具有贡献的法律人类学家之一。

随着对初民社会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的不断深入,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法律人类学研究实现了两个重大转变。转变之一是,由带有明显功能主义倾向的寻找规则与解释规则的共时态研究,转向对实际的纠纷事件及其处理过程的历时态描述。促成这一转变的是利奇(E. R. Leach)、格拉克曼和霍贝尔等人。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人们观念中的假定规则与实际行动中的真实规则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在格拉克曼研究的北罗德西亚的巴罗策人(Barotse)中,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合理,其标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取决于场景、公众的道德、观点、信仰以及习俗等。由此他们提出,人类学对法律的研究不应该以假定的规则为出发点,而是要结合对典型纠纷案例的分析,通过对事件发生原因和过程(包括动机和结果等)的分析,去归纳出真正具有权威效力的法律规则。对过程的强调,后来又进一步转向对与纠纷和争端相关联的“博弈”行为的分析。这种分析的特点是,它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纠纷的当事人和裁决者身上,希望通过探讨他们如何利用权力和规则进行“博

Boespil, Leopold, 1967, pp. 27 ~ 41.

Bohannan, Paul, 1957.

Roberts, Simon, 1979.

林端, 2002, 第 21 页。

霍贝尔将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的法律人类学研究方法分为观念方法、描述方法和案例方法三种。参见霍贝尔, 2006, 第 28 ~ 43 页。

Rattray, Robert S., 1929.

Barton, Roy F., 1949.

霍贝尔, 2006.

Guckman, Max, 1955.

弈”,各自在纠纷中扮演何种角色等,去发现法律、文化和个人这三者间的关系。从规则和秩序的研究转向对纠纷的发生及其解决的过程和行为的研究,标志着法律人类学研究逐步趋向深入。

转变之二是,从对初民社会法律文化的研究,转向对西方社会中不同文化背景下争端与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其历史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学的学科传统。一方面,过去的西方殖民地社会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人类学家因为曾经背负“充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走狗”的骂名,而在这些国家中不受欢迎,他们的田野调查工作遇到巨大的障碍,甚至根本就无法开展。另一方面,人类学所研究的传统社会被整合到新的国家体系中,由于受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它们大多不同程度地失去了自身原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者纷纷将关注的重点从初民社会转向西方社会自身,探讨诸如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印第安人诉讼中如何运用人类学的证据和类似的专门知识的问题。澳大利亚的法律人类学家则参与土著居民遗址的保护工作。因为有了过去对初民社会法律研究的扎实基础,从比较和反思的角度对西方社会法律过程的研究已成为可能。但与过去的研究相比较,他们更多地将法律过程置于一个更广泛的民族甚至国际化的背景下,关注国家的作用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对法律的影响。

### 三、20世纪70年代以后： 寻求对法律文化的理解与阐释

在对初民社会的法律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人类学者们发现,欧洲殖民者在对外殖民扩张时,曾经将西方的法律强行“移植”到殖民地社会,但是它们不仅未能取代初民社会原有的法律规范,反而造成了殖民地中两种或多种法律秩序并行的状况。法律人类学家将这种两种或多种法律制度共存于同一社会的状况称为“法律多元主义”(legal pluralism),并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对许多殖民地社会来说,西方法律也许并非第一个外来法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口迁移、法制变革或被外族征服等内部或外部的因素,都可能导致法律多元的现象在一个社会中出

现。例如,在印尼爪哇岛,由于来自中国南方和越南北方的居民、印度和中国的商社、伊斯兰教传播者、荷兰和英国殖民者、日本占领军以及印度尼西亚国家等多种力量的相互碰撞,就存在着复杂的法律多元现象。对法律多元问题的认识,表明人类学对法律文化的理解在逐步加深。

20世纪7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用“法律多元”的概念来研究非殖民地社会特别是欧美工业社会,由此产生了“新法律多元主义”(new legal pluralism),以区别于研究殖民地和殖民地后社会的“古典法律多元主义”(classic legal pluralism)。“法律多元”的概念也因此扩大,从指称本土法律和外来法律(西方法律)的关系,转变为指称国家法律与非国家法律(各种社会性规范)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表明,不仅在殖民地社会,而且在现代西方社会,也存在着法律多元的现象。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也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一定程度的外来影响,有文化的断裂和更新,有大量的移民,有宗教、民族、文化、性别等方面的少数群体,更有社会阶层,因而在实际上存在着规范和秩序的多元化。“法律多元主义”概念的提出,与人类学广义的“非国家法律观”是分不开的。梅莉(S. E. Merry)说:“由于法律制度这一概念非常广泛,可以说,每个社会在法律上都是多元的,而不论其有无殖民地的历史。”

新法律多元主义强调对法律多元现象的动态研究。它认为,民族国家的法律甚至国际法,通过殖民主义、民族国家法律的形成、法律机制的改革等多种方式,不断地渗入并改造地方社会领域。过去的古典法律多元论对法律多元性的理解仅限于地方、国家和跨国法律体系的共存,这种理解往往导致对法律多元性的静态分析,而未能探讨各体系之间的互动和成分交叉或各体系之间权利不平等的影响。梅莉特别指出,国家和国际的背景在对地方状况的理解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法律

有学者对这一转变进行了专门介绍。参见乔丽荣、仲崇建,2005。

参见张冠梓,2003。

参见格尔兹,2000。

杨方泉,2003。

Merry, Sally E., 1988, p. 869.

多元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关注国家法律如何渗入和重构其他规范性秩序,非国家的规范性秩序如何抵抗和避免这种渗透甚或它们如何控制、利用和影响国家法律”,并且关注“这种法律多元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历史变迁”。

在法律多元论的影响下,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C. Geertz)又将人类学对社会文化背景的强调,扩展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理论主张。在《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一文中,格尔兹提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所谓地方性是指,法律不仅与地域、时代、阶级以及问题的多样性有关,而且还与直觉和直接个案相连。它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由不同的人群,根据不同的场景创造出来的,在创造时固然要顾及某种社会需求,但其中也注入了创造者的想象、信仰、好恶、情感和偏见,这样的法律表达了特定的文化选择和意向。人类学家所要做的,就是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出发,运用“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对作为被理解的客体的法律进行文化意义上的阐释。这种阐释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寻求一般性的规律,而是为了达成对“他人理解的理解”。格尔兹关于法律的定义表明,他不满足于法律的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解释方法,他把自己的方法称为阐释学的立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法律人类学研究的视野更为广阔。在反思人类学的背景下,针对此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典型纠纷案例的特点,一些学者指出,这种研究框架过于狭窄。他们提出,法律人类学要继续生存与发展下去,就应当具有更广阔的视野,甚至跨越学科之间的界限。受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迪厄的结构能动性理论的影响,他们主张把纠纷纳入到更大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去,审视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纠纷与社会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政治等级、意识形态等因素之间的广泛关联。简而言之,他们试图将法律研究与权力研究、历史研究和经济研究等结合起来。在198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美国人类学家斯塔尔(June Starr)和科利(Jane F. Collier)提出,要引入历史的维度来研究法律的变迁。在此后由二人合编的一本论文集《法律研究中的历史与权力》中,他们进一步在批

评狭隘的纠纷研究的基础上,展示了如何将历史和世界体系纳入到对纠纷的分析框架中。他们在“导言”中指出,文集的诸位作者不再将变迁和权力差异看做纠纷处理的结构分析或结构—功能分析中的变量,而是通过权力差异来理解法律变迁的过程和某些法律思想和机制的长期传承;他们不再讨论社会如何和平解决纠纷,而是要回答个人和群体如何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利用法律资源达到他们的目的;不再关注规范体系或纠纷处理,而是分析法律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体系之间的关系。

更有一些学者超越法律人类学研究的传统主题,转而关注20世纪末突显的热点问题,如人权、公民身份、国际法等。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方法上也出现了某些新的突破。例如,维尔森(R. Wilson)等人在研究人权状况及某些极端迫害的案例时,关注的并非客观事实,而是话语,即这些状况和案例被报道和讨论的方式。这表明,法律人类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它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尽管有批评指出,法律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而且它也越来越缺乏共同的研究主题和范式,但这正是这门学科的活力所在。

#### 参考文献:

1. 梅因著,沈景一译,1996,《古代法》,商务印书馆。
2. 恩格斯,1972,《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3. 林端,2002,“法律人类学简介”,载《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 马林诺夫斯基著,原江译,2007,《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法律出版社。
5. 拉德克里夫-布朗,潘蛟等译,1999,《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6. 埃文斯-普理查德,褚建芳等译,2002,《努尔

参见高丙中、章邵增,2005。

“深度描述”与“浅度描述”(thick/superficial description)相对应,它强调描写和观察方式的特定化、情境化和具体化。

格尔兹,2000。

Starr, June and Collier, Jane F., 1987.

参见高丙中、章邵增,2005。

Wilson, R., 1997.

- 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华夏出版社。
7. 霍贝尔著,严存生等译,2006,《原始人的法——法律的动态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
  8. 格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2000,《地方性知识》,中央编译出版社。
  9. 张冠梓,2003,“法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其流变”,载《国外社会科学》,第5期。
  10. 赵旭东,2005,“秩序、过程与文化——西方法律人类学的发展及其问题”,载《环球法律评论》,第5期。
  11. 杨方泉,2003,“法律人类学研究述评”,载《学术研究》,第2期。
  12. 乔丽荣、仲崇建,2005,“从博弈到认同——法人类学关于纠纷研究的旨趣、路径及其理论建构”,载《黑龙江民族丛刊》,第6期。
  13. 高丙中、章邵增,2005,“以法律多元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14. Moore, Sally F., 2005, *Law and Anthropology: A Reader*, MA: Blackwell.
  15. Pottage, Alain and Mundy, Martha (eds.), 2004, *Law, Anthropology,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ocial: Making Persons and Th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Mundy, Martha (ed.), 2002, *Law and Anthropology*,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7. Rouland, Norbert, 1994, *Legal Anthropology*,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8. Pospisil, Leopold, 1967, The attributes of law, in Bohannan, P. (ed.), *Law and Warfare: 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 Bohannan, Paul, 1957, *Justice and Judgement among the Tiv*,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 Roberts, Simon, 1979, *Order and Dispute: 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Penguin.
  21. Guckman, Max, 1955, *The Judicial Process Among the Barotse of Northern Rhodes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2. Rattray, Robert S., 1929, *Ashanti Law and Constit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 Barton, Roy F., 1919, *Jugao Law*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Vol. 15, 1919).
  24. Merry, Sally E., 1988, Legal pluralism, in *Law and Society Review*, Vol. 22, No. 5.
  25. Starr, June and Collier, Jane F., 1987, Historical studies of legal change,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8, No. 3.
  26. Wilson, R. (ed.), 1997, *Human Rights: Culture and Context*, London: Pluto Press.

(本文作者:董建辉,男,1966年生,博士,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361005;  
徐雅芬,女,1965年生,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361005)

(责任编辑:新 晴)

### 《警察与犯罪心理学期刊》

《警察与犯罪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Police and Criminal Psychology*)是警察与犯罪心理学协会的官方刊物。协会旨在鼓励对刑法系统开展科学研究,利用科学知识来解决刑事司法中出现的问题。刊物每年出版两期,主要刊登与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从业者与研究者相关的文章。

刊物网址: <http://jpcp.asp.radford.edu/index.htm>

ISSN: 0882-0783

(真)